

当代儒学创新发展的典范

——陈来《仁学本体论》述论

翟奎凤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仁学本体论》对两千年仁学发展的脉络作了全面呈现,对现代新儒家及李泽厚的“本体论”也予以扬弃,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一套新的“仁体论”思想。“仁体”是统贯“理气”“心性”“物我”的一体存在之生生,其根本和首要的功用特征是仁爱 and 翕聚。面对社会价值与世道人心的重建,陈来先生提出“仁体”统贯仁爱、自由、平等、公正新四德及“仁体和用”的思想,舒张了儒学内圣外王的宏阔气象,为当代儒学的重构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仁学本体论》是两千年来儒家仁学思想及本体论思想的集大成,是现代新儒家之后儒学创新发展的又一大理论突破。“仁学本体论”以仁统“理气”,凸显其爱的维度,对当前儒学回归百姓的生活世界会有很大推动作用。仁体论一再强调气于一生生之仁的重要性,呼吸四海、吐纳古今、生生不息、刚健有为是全书的精神风貌,也是今天走向全面复兴的伟大中华民族的精神写照。

关键词:仁本体;万物一体;生生;气;仁统四德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670(2017)03-0022-05

2015年10月,第三届思勉原创奖发布,陈来先生的《仁学本体论》(又名《新原仁》)入选。这本书2014年6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刚出版一年就入选,在三届思勉原创奖中是少有的。这固然是因为陈来先生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儒学大家,更是因为该书确实富有原创性,有着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为张岱年先生的高足,陈来先生曾这样谦虚地说:“张先生门下可以说有两派,一派是综合创新派,一派是心知其意派,我算是心知其意派。”^[1]其实从《仁学本体论》来看,陈先生不仅是心知其意派,同时也是综合创新派,是张先生全面的衣钵传人——盖唯心知其意,才能做到真正坚实的综合创新。

《仁学本体论》一书可谓体大思精,对先秦至宋明两千多年仁学发展的脉络作了全面细致的梳理,是一部活生生的仁体演生精神史。该书发展了古人特别是朱子的仁体思想,在吸收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本体论,回应李泽厚情感本体论、近现代以来西方哲学的问题及其困境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仁体”思想。“仁体”是统贯“理气”“心性”“物我”的一体存在之生生^①,其根本和首要的功用特

征是仁爱 and 翕聚。同时,该书立足当下中国与世界,积极面对社会价值与世道人心的重建,提出“仁体”统贯仁爱、自由、平等、公正新四德及“仁体和用”的思想,舒张了当代儒学内圣外王的宏阔气象,为当代儒学的重构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一、先秦两汉的仁学

《仁学本体论》之《原仁上第二》《原仁下第三》是论先秦两汉的仁学思想,这一时期富有代表性的是《论语》《易传》《礼记》《春秋繁露》中的仁学思想。

陈来先生分析指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作为一种美好的德性,孔子之前的仁更多与爱亲关联在一起,家族血缘亲情的因素比较浓厚。在孔子乃至孟子那里,孝悌、亲亲仍然是实践仁德的重要源发性起点;但更重要的是,仁在孔子那里得到升华:仁是一种普遍的人道之爱,超出了血缘伦理。孔子的伟大贡献在于,他能够突破传统礼学对仁说的局限,坚持“仁者爱人”的精义,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等普世的道德金律。孔子对于仁只是在生活实践中针对不同的学生对象予以指点,并无太多高深哲

收稿日期: 2017-03-08

作者简介: 翟奎凤(1980—),男,安徽亳州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儒学研究。

①陈来先生言仁本体四义,仁为本体,是万有之本;仁本体是流行统体;仁本体是生生之源;仁本体是人与万物为一体;又说,“生即是本体之自身,体现为大用流行总体,本体流行只是生。此生必带起翕辟之势用,翕为本,辟为辅,翕主关联,辟主散化”(见该书第68页)。

理之论说。孟子的“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进一步彰显了仁德普遍的人道主义及他者优先的立场,所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把仁看作是心的本体之德。《易传》把仁的意义加以扩大,使仁与天地之生生开始联结起来,并把仁与“元”对应起来,于是仁不仅是善的根源,也可以是宇宙的元初根源,是生命的动力因,开始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2]16}。

《礼记》一方面仁义并举,说“仁以爱之,义以正之”(《乐记》),强化了仁的宽厚相亲相爱义;另一方面仁智并提,“成己仁也,成物智也”(《中庸》)——把仁定位为己之性德,引向内在的性之本体;而把成物看作是智德的作用,是实践向外的作用。这就不能把仁体作整体的呈现了^{[2]115}。《乐记》还说“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与《易传》类似,把仁赋予了宇宙论意义,仁与生、与天有了关联。《乡饮酒义》中还有“天地之仁气”的说法,仁与气有了关联。陈来先生认为:《礼记》关于仁的讨论是多向度的,仁也开始成为最全面根本的一种德性。

关于汉代的仁说,陈来先生指出,董仲舒的仁学思想在汉代最富有代表性意义,他以博爱论仁,后来为唐代的韩愈所继承发扬。董仲舒反对以自爱为仁,强调仁是对他人的爱。从道统论立场上,过去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宋儒与汉儒的断裂性和差别性;从仁学的立场来看,宋儒与汉儒及先秦儒是一脉相承的。

陈来先生还指出,汉代的仁说思想以“仁者爱人”为出发点,更重视仁的政治实践意义,强调仁是对他人的爱,突出了他者的优先性。汉代以前有两种天地之心的讲法:一是“复,见天地之心”(《易传》),一是“人为天地之心”(《礼记》)。这是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不同哲学意识在天地之心问题上的反映,前者侧重天地自然运行的生机和规律,后者从价值的角度突出人在宇宙中的意义。陈先生认为:“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古代仁体论,古代仁体论更多归属于宇宙论,与近世实体的仁体论形态结构有所不同。但仁的宇宙论与仁的本体论是一致的,都是把仁上升为形而上学的实在。”^①

应该说,在先秦、两汉仁说已经有了丰富的内涵,为仁本体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魏晋、南北朝、隋唐是“儒门淡泊”时期,在仁学理论上无实质性的创见

和推进。故比较成熟而明确的仁本体思想在宋儒那里才基本建立起来。

二、以朱子、阳明为代表的宋明仁体思想

《仁学本体论》一书之《仁体第四》《道体第五》《天心第六》《万物一体第七》《生物之心第八》《生气流行第九》等都是论宋明儒的仁学思想。宋明时期是仁学思想发展的高峰,作为宋明理学大家,陈来先生对这一时期的儒学思想了如指掌。因此,这几章的讨论辨析非常精深独到,在对宋明儒的诠释上很多是发前人所未发,所提出的很多新观点、新论断也代表了百年来宋明理学研究的新突破、新成就。

《易传·文言传》说“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先秦已有“体仁”之说,但哲学本体意义上的“仁体”一词则出现于北宋。程颢说“识得仁体,实有诸己”^[3],意味着“实体的仁体既是人识得的实在对象,也可以成为个人拥有的东西,实体是可贯通到人的身心的实在”^{[2]170}。程氏虽未明说,但潜在是有此意涵的。后来的宋明儒者大多是朝向境界与体验方面来了解“仁体”的内涵,这是时代对仁体显现的限定。程颢还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陈来先生认为程颢在这里“强调仁体的境界义、功夫义,但蕴含着本体义。……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因为天地万物本来是一体,仁体即是天地万物浑然的整体。这种一体性就其实体的意义说,与‘气’密不可分,因为气贯通一切,是把一切存在物贯通为一体的基本介质”^{[2]173}。朱子明确把气作为仁体的实体,把生生和爱都看作是气的不息流行的自然结果;认为“仁者生之理,而动之机也”,仁是生生之理,也是活动流通的内在动因。明代阳明后学万思默说“生活是仁体”^[4],强调仁体贯穿于生活世界,这是明代仁体思想的一个很有意义的特色。中国哲学所说的实体一般是就天地造化而言的,指天地变易流行的总体,是一个宇宙论的概念。朱子认为道之本原作为实体既“出于天”也“备于己”,但“朱子始终没有真正确意识地,实体亦即是仁体”^{[2]203}。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的实体论不关注实体的属性、样式,而是关注实体的发用流行、如何处理实体与大用的关系;直到现代,中国哲学都在努力解决这一重要问题。针对阳明心学“本体即主体”的思想主旨,湛甘泉强调“本体即实体”,实体就是天

①陈来先生认为,在董仲舒之后,宋明儒以仁论天心,首推朱子,但他并不是简单地回到董仲舒,而是把北宋易学讨论中的“天地以生物为心”“以生物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仁联系起来,用仁去规定易学讨论中的天地之心的意义。

理,本体不能仅仅理解为内心。相对于实体,道体是宋明理学更常见的本体论的另一种表述。在朱子学,道体即是最高实体。道体概念最早为程颐所提出,他认为道体本身不可见,透过现象可以见道之体;而朱子认为天地生化流行就是道体本然,就是实体,离开生化流行别无道体,强调了实体与现象的一致。在仁与道体的关系上,由于朱子未能完全确立起仁体的实体观念,所以他既说仁未能尽得道体,又说仁足以该道之体。这是朱子仁学不彻底的地方,陈来先生认为,“若真识得,仁便是尽得道体,仁亦足以该贯道体”^{[2]215}。阳明学者董澐说“所谓道体,即是仁也。仁只是一团生生之意”,此对仁本体真义的发明甚有功;他还主张慎独以体仁,“还其无声无臭之天,则万物一体而纯亦不已”^{[4]294},这正是回归本体实体——万物一体的本体仁体。

宋儒程颢、杨时、吕大临、游酢等都以“万物一体”来释仁,但是仁作为万物一体主要还是被理解为人心理想的精神境界,还没有强调仁的万物一体的客观实体义。明代王阳明的“一体之仁说”较宋儒有所深入:一体之仁不仅在境界上应然如此,在心体上本然如此,在存有的状态上也是实然如此。在阳明那里,气的概念使万物一体之仁的实体化成为可能。从张载到王阳明,宋明儒者都没有放弃过气的观念,“气流通”不仅具有物质实体义,同时也包含着视宇宙为一个有机系统,强调万物与我的息息相关的不可分割性。这个有机系统的总体即是仁体,从而仁体可以超出心体成为宇宙的本体^{[2]301}。

在朱子看来,只从存在论上讲仁是万物之体,这还是不够的;必须同时从宇宙论上肯定仁是天地万物之心,仁是世界生成的根源,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万物一体于仁。在朱子学后期,仁作为生意、生气流行的实体,已经不是一般所理解的静而不动的理性了。就天地造化而言,仁既是理也是气;就人心性命而言,仁既是性也是心。朱子用周流贯通之气的流行论,发挥程颢的生意说与程颐仁包四德观念,使得仁也成为具有贯通能力的实体——气论影响的结果使得朱子的仁学更关注实体、总体的意义了。如果说理气是二元分疏的,则仁在广义上是包括了理气的一元总体,“在这一点上,说朱子学总体上是仁学,比说朱子学是理学的习惯说法,也许更能突显其儒学体系的整体面貌”^{[2]357}。朱子重视大用流行之整体,强调大用流行作为仁的意义,然而未及论述仁体与流行的关系。生气是大用,是流行;但从熊十力体用论的角度看,这还不是本体自身。虽然仁体不离大用,不离流

行;但终须指点仁体,指明生气流行是仁体的全部显现,始为善论。“朱子只差说一句,此流行统体便是仁体。”^{[2]45}

三、现代新儒家与仁体论的建构

《仁学本体论》既是古代仁学思想的集大成,同时也融摄了现代新儒家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本体论思想的积极成果。

熊十力晚期主张体、用皆为实有,实体不在功用之外。实体是大用的自身,实体自身完全变现为大用;即用即体,实体自身是生生变动的。熊十力的这一体用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禅学与易学智慧的融合。陈来先生认为:“晚期熊十力的体用论哲学为现代儒家哲学提示了一个实体非心非物的哲学发展方向,一个超越新心学和新理学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在21世纪应有其特别的意义。”^{[2]374}在陈来先生看来,仁体论可以与“即体即用”的本体论结构结合而成为仁学本体论的基础。

马一浮在理气问题上讲“全体是用,全用是体”的思想仍未超出理学的范围,但可以看作熊十力即体即用说的另一种补充性表述。马一浮更强调摄用归体,熊十力后期则提出摄体归用。在这一点上熊十力更具突破性,真正达到了全体大用,实体完全变成大用。在陈来先生看来,把马一浮与熊十力结合起来,用熊十力的即体即用的实体论诠释马一浮的“全提全是论”,或使它们相互诠释,才能激活马一浮全是论的本体论意义。仁体可以全体是用,全用是体,实体可以变现为现象总体,现象总体是实体的全部显现,仁体比起理体更具有遍润宇宙的势用^{[2]380}。

梁漱溟认为,宇宙万物的生命实际上是一不可分、不可隔、互相关联的总体、整体,宇宙大生命是“一体”。陈来先生认为,“梁漱溟比熊十力更接近于仁学本体论”^{[2]384},宇宙大生命是通为一体的。可惜梁漱溟未能直指此宇宙大生命即是本体,即是仁本体,“这使他晚年的哲学与仁学本体论的建构失之交臂”。他的宇宙生命论虽然属于宇宙本体论,但主要倾向是用生命代替实体,不是实体的本体论。陈来先生认为,“他的思想体系如果用仁或仁体来贯穿,应该更为合理”^{[2]388}。

四、仁体论与当代儒家价值体系的挺立

仁是儒家价值的源头活水。长期以来,儒家价值没有很好地讲清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因为我们没有从哲学的形上高度把儒家的仁学弄清楚。仁学

本体论立体达用,洋溢着浓郁的儒家价值情怀。陈来先生在书中反复强调仁体的关联共生这一特征,认为万物关联共生的整体为仁体,为本体,这是仁体的第一要义。仁构成了本源性的关联世界,从仁的存在论或本体论角度看,人的存在本质不是个体的独自生存,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儒家不仅重视作为个人的他者,更重视作为他者延伸的共同体,儒家的群观念包含了人们共同生活在共同体的理想,个体是共同体中的个体;仁是个体通向共同体的交往方式和规范,人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成为共同生活的整体^{[2]84}。其实,孔子早就指出人是“群”的存有,而“世界”也只有有在“群”的意义上才有意义,在群之在才是最原始的在。因为世界是最大的“群”,而人的在群首先是在“家”,这是最原始的存在方式,而这一最原始的人的存在方式,亦即是仁体在仁的在世存在的直接显现^{[2]60}。人的价值是在与家庭、与他人发生关联的关系环境中产生的,所以自我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共同体中形成的^{[2]82}。应该说,强调家、国、社会、天下这一共同体“群”的观念,是儒家与佛老的重要区别。

仁体观念对“群”的强调也突出表现在陈来先生对翕辟的论述上。翕辟是仁体生生的两大势力。与熊十力翕辟成变论更强调辟的重要性不同,陈来先生认为“翕作为宇宙的本质倾向即是仁的根源性表现”^{[2]65},翕主关联、聚合,辟主发散、独立,两者相反相成,都是仁体生生的势用。尽管如此,陈来先生还是一再提醒:翕是一体化的倾向,辟是个体化的倾向;翕为本有,辟为后起;要以翕为主、辟为辅,翕是聚合、关联、维系、吸引,即是仁,即是爱。因此,这里面还要突出爱的重要性,没有爱的关联、聚合就不是仁的表现,一定要有爱的精神在里面牵引,这样的聚合才是仁的精神。

陈来先生的仁体论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当代展现。仁体是个人道德修身的最高境界,也是社会价值理想的根本归宿。仁是最高的德行,其性质是仁慈博爱。在儒家的立场上,仁内在地要求把自己实现为社会秩序和政治实践,这就是孟子所宣扬的仁政精神。仁代表了儒学的最高精神境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是天地的生机,天地的心,是宇宙的道体^{[2]78}。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要求自我身心的贯通,自我与他人的贯通、与社会的贯通,最后与生生不息的天地整个大存在贯通,才是仁体精神的

完全呈现。

根据宋儒仁统四德的思想,面对现代的社会价值取向,陈来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仁体统帅并贯通仁爱、自由、平等、公正以及“仁体和用”的思想。陈来先生在阐释新的仁统四德思想时说:仁统四德,“仁爱是仁之春,自由是仁之夏,平等是仁之秋,公正是仁之冬;仁爱是仁之本体的本然流行,其他三者是仁的流行的不同表现。自由是仁之活动无碍,平等是仁之一视同仁,公正是仁之正义安排,和谐则是仁体流行的整体要求”^{[2]429}。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五德在现代社会仍有其重要价值,这五德主要是就个人的道德修身而言的;陈来先生所提出的仁爱、自由、平等、公正,加上和谐,这新五德主要是就社会价值而言的。自由、平等、公正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价值以仁为体、以社会的总体和谐为目标^①,就富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内涵的极大丰富。

陈来先生认为,“仁爱、自由、平等、公正、和谐,就是现代全球社会需要的五项基本价值”^{[2]498}。此论可以说是中国价值的现代世界性展示,体现了儒学一直以来的社会天下情怀。仁体思想也必然指向儒家一直以来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过去我们常把大同看作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社会理想,其实大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这种公天下的趋向也可以说是由仁体——一体生生之仁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抉择。我们可以把仁爱、自由、平等、公正、和谐看作大同社会的总体特征,这些特征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展现,也可以说都有大同因素,只是多少高低的不同。因此,没有必要把大同看得高不可攀,我们本身已经在大同之中了,只是需要努力把大同的程度更多更好地呈现出来而已。具体来说,需要从仁爱、自由、平等、公正、和谐这五个方面来推进大同精神,进一步展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陈来先生的《仁学本体论》既是对“讲仁爱”最好的诠释,同时,依照陈来先生的仁体论思想,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也都可以看作是仁体精神的具体展现。

五、当代儒学创新发展的典范

两千年来,儒学一直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以及社会秩序建构的主要思想资源。晚清以来,在西方入侵和民族危亡的巨大生存压力下,儒学乃至整个传统思想

①陈来先生说“从儒家的观点来看,仁就是体,而自由、平等、公正、和谐都是用,仁是统领,其他的价值要在仁的统领下发用,才是合理的关系。”

文化被逐步边缘化。为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和价值体系,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马一浮等现代新儒家做出了卓绝的努力,使儒学与中华文化的精神之光得以重新绽放。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现代新儒家成就背后的历史局限,他们的思想建构或融入了太多的西学资源,或借助了过多的佛学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所呈现的儒家价值不够纯粹。有些现代新儒家的著作由于借助西方哲学的概念太多,中国味或儒家味就显得很不够,儒学与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没有很好地彰显出来,以至过于深奥晦涩,离百姓日用越来越远。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他们的历史功绩。在那个“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环境下,他们从理论上做出了最好的回应。

近几十年来,儒学与中华文化重新回归社会和百姓的大势蔚然形成。在中华民族迈向全面复兴的今天,文化也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机遇,是儒学与中华文化大创造、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这是陈来先生《仁学本体论》写作的时代背景。与现代新儒家的著述相比,《仁学本体论》有着自己明显的特色和优势。“仁”是贯穿两千年儒学发展的一条主线,从整个儒学发展来看,“仁”无疑比“理”更为重要和根本,更有贯通性。因此,儒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仁学精神史。陈来先生慧眼独具,以仁学来打通先秦、汉宋儒学,这比现代新儒家多是接着宋明理学来讲的视野更宽阔,更富有历史的整体性和全局性。《仁学本体论》超越了宋明理学以及一些现代新儒家狭隘的道统观,把儒学本身看作一个生生不息的活的传统。站在仁学本体论的立场上,陈来先生对汉儒特别是董仲舒的仁学思想予以高度的肯定性评价。虽然近代以来,直到近些年,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仁学对建构新儒学的重要意义,但《仁学本体论》在贯通古今、汇融中西哲学问题的基础上,面对当代中国与世界世道人心及价值秩序的重建,发展出一套内圣外王、明体达用的气势恢宏的思想体系。没有多年的深厚学术积淀、富有

创造性的学术智慧,没有坚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没有深切的民族和时代关怀及责任担当意识,很难写出《仁学本体论》这样厚重的著作。

以仁为体来建构新儒学,挺立了儒学与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同时该书有广泛的世界思想文化意识,多方面回应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前沿问题,凸显了仁体思想的价值优越性,体现了作者近年来一直强调的“中国主体,世界眼光”的文化主体性意识。如在共在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上,《仁学本体论》广泛讨论了海德格尔、萨特、列维纳斯、马丁·布伯等在这一问题上的合理性思考,对其不足之处也予以点出。而且,该书在对西方思想的回应上紧抓问题的核心与根本,点到为止,并不过多地去铺陈西方的思想。这使得该书既有广泛的世界性视野和问题意识,又不蔓不枝,紧扣仁体来凸显儒家价值的主体性和优越性,以及儒学在新时代下的价值自信。该书中正平和,不激不随,从容不迫,刚健有力,充分彰显了华夏儒学应有的内在气质。《仁学本体论》可谓是新的时代下中华民族精神的绽放,其在当代儒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征程中,无疑有着典范作用和里程碑意义,必将有力地推动儒学与中华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参考文献:

- [1]陈来. 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268.
- [2]陈来. 仁学本体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 [3]沈善洪. 黄宗羲全集:第三册[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677.
- [4]黄宗羲. 明儒学案: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505.

(责任编辑:孙军红)